

September No.6

第六期 2009年9月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Autumn 2009

北京外国语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主办



出版人

郝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编委会顾问

郝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陈佳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Sorn Samnang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禹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冯俊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吴景平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杨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虎雄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odnomtseren Altantsetse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Vu Ngoc T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郭栖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赵宗锋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主编 郭栖霞 赵宗锋

编辑 谷晨曦 王惠英

装帧设计 蔡颖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4, 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目录

Autumn 2009 September No.6

特稿

- 4 第五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西宁举行

学术活动

- 6 第三届国际暨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讨会成功举行



研究进展

- 7 英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综述
12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22 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研究文献的调查研究
25 21世纪初的中俄地区间合作：成就、问题与前景
28 政治软实力与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

人物与著作

- 34 《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

研究机构

- 38 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简介
39 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简介

第五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西宁举行



2009年7月22日至24日，由南开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支持的第五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西宁举行。会议由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青海民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承办。

青海省副省长高云龙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教育厅副厅长赵海平、青海民族大学校长何峰出席了开幕式。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庆山在开幕式上致辞。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7人，分别来自于国内十个亚洲研究中心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京论坛和上海论坛秘书处。其中包括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西藏大学副校长王启龙、延边大学副校长崔炯谟、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部长程郁缀、北京论坛秘书处秘书长严军、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孙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辽宁大学教务处处长杨志安、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栖霞、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宗锋、延边大学亚洲

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香海等。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李在胜、廉载镐、韩国西江大学教授尹炳男、江原大学教授高在旭、SK集团代表朴在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京办事处主任康泰硕、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及其他人员也出席了会议。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等4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亚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与会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和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做了主题发言。秦绍德教授关注了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指出“在应对和化解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亚洲各国充分认识到，分散化的政策可能难以有效回应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之间的集体行动才能更有效地斩断危机在时空两个层面的传染链条。”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需要增强金融合作，通过经贸合作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通过协调投资与就业来推动结构转变，增强亚洲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发言中总结了亚洲国家合作的经验，从已有的合作机制入手，对比欧美的合作，分析了亚洲国家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今后合作的方向。他对亚洲国家已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检讨，指出了沿海发展模式的局限，提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陆模式。

在工作会议上各中心和论坛汇报了自己前一年来的工作，交流了关于中心和论坛的管理经验，主要包括论坛和中心两大类。

论坛的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各论坛已经形成固定的机制，与政界、商界、学术界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注重与媒体的合作，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
2. 各论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国内和国外，政

界、商界、学术界均很关注各个论坛。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曾接见了2008年参加北京论坛的部分代表。

3. 参加学术讨论的论文水平高，论文的影响广泛，且与会者多为知名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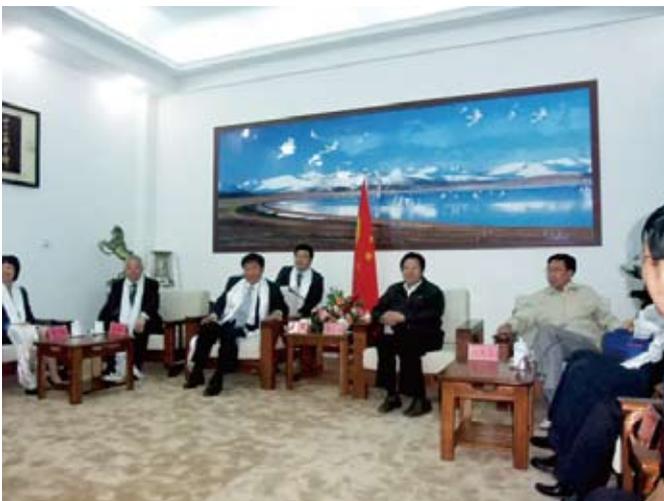
中心的工作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心研究资助的方向。各中心资助课题的研究包括两类：一类是对来自文科各个学科的研究支持，另一类是区域研究资助，以东北亚地区研究为多，特别是对韩国的研究或有关韩国的研究，比如中韩比较类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心已经开始扩展研究方向，比如从东北亚研究扩展到西亚研究。

2. 中心的日常的管理。目前各个中心日常工作大体上是相同的，即项目（包括课题、会议和著作）资助和选拔赴韩学者。但是各个中心在项目资助的方式、额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在课题资助方面，清华大学按照A类（重大课题）、B类（重点课题）和C类课题（一般课题）的方式来进行，南开大学则是主题资助和学科资助轮换进行。在管理方法层面上，中国社科院目前已经实现了课题申报、中期检查和结项检查的电子化和网络化。

3. 中心的交流与合作。不同亚洲研究中心之间、特别是国内的十所中心的交流与合作是代表们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代表们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心主任的联席会议应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每年的8月份召开，会议一致通过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二是若干中心联合搞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如就亚洲学的研究，目前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已经共同举办了2次亚洲学论坛，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已经开始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进行合作。三是作为后援单位支持和参与某一中心的活动。此外，代表们还就如何进行资料的共享、网页的链接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议。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金在烈总长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金总长指出，各个中心和论坛的活动，使得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亚洲研究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学者们研究亚洲的热情明显增长，财团通过中心和论坛资助的出版物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金总长肯定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合作，并希望今后各个中心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研究方向上，他特别提出今后应该重视对中亚地区的研



究。金总长对北京论坛、上海论坛、亚洲传媒论坛、国际儒学论坛、东北亚论坛、图们江论坛的工作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分别指出了各个论坛的发展定位。

金总长对会议的举办方南开大学为此次会议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对青海民族大学的支持表示感谢，对此次会议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他指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将致力于促进亚洲研究中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术团体之间开展合作研究，让中国的学术在世界的学术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并最终让东方的文化走向世界。

会议主办方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教授在闭幕式上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第三届国际暨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讨会 成功举行



范捷平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面具的现代性——以瓦尔泽小说为例；费春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殷企平教授（浙江大学）：弗罗斯特和道家思想；钱兆明特级教授（美国新奥尔良大学）：东方文化与英美现代主义的崛起；区鋐教授（中山大学）：庞德与中国；北

2009年6月13日-14日，由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所、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编辑部、浙江省外文学会和浙江省翻译协会等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暨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西湖边的三台山庄举行。

东方文化对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这一关注以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为显著标志：1996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在剑桥大学举办的相同议题的国际研讨会。这两次国际研讨会，会同其它相关会议，使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关系研究成为当今显学之一。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

研讨会议题主要有：1.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2.现代主义作品与东方文化；3.现代主义批评与东方文化；4.现代主义文论与东方文化。参加并发言者有：
（按姓氏笔划排序）孙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张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艾略特<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印度教思想；杨仁敬教授（厦门大学）：海明威与中国；林力丹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贝卡特与中国音乐；



塔（诗人、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期象征主义文学中的印度宗教意象和拯救话语；高奋教授（浙江大学）：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中国传统诗学等。

会议主席钱兆明教授致闭幕词，他对会议主办方和与会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总结了会议的主要学术成果，鼓励学者们就相关课题继续深入研究，并邀请与会各位明年再聚杭州参加“第四届现代主义和东方文化国际研讨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赵倩

英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综述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田小惠

[内容摘要] 本文在简要介绍英国中国学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主要从英国大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主要学者的研究动向两方面对冷战后英国当代中国研究及中国政治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并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出英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特点。

[关键词] 英国当代中国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

当代中国政治是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有必要了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概念界定。目前，国内学界就这一问题普遍认为：汉学（Sinology）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进行研究，中国学（Chinese Studies or China Studies）²则侧重于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³从学科地位上看，汉学在中国学出现之前就已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中国学则被置于区域研究之中。⁴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Sinology”，“Chinese Studies”和“China Studies”的

研究对象已在互相接近和兼容，而使用“中国学”的称谓，显然比“汉学”显得宽泛、更具包容性。⁵然而，也有国外有学者认为“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汉学的自然产物”⁶。但国内外学者较普遍地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欧洲主要大学院系和研究机构开始接受并不断加强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始。

一、英国中国学研究概况及主要推动力

二战前，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文字、文学，以及中国哲学领域。战后，虽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就中国研究的学科位置及机构设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的主张既保留汉学，同时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放在独立的院系中进行；有的则主张将有关中国研究的各个主题分解到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系中，但由于英国学者普遍强调从事中国研究最关键的因素是语言，因此，在英国一直存在“有关中国的研究继续放在语言系中的必要性”。⁷即使如此，也有学者认为：二战后，欧洲汉学的重大发展首先发生在英国。⁸

- 1 本文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资助，同时本文是笔者于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完成的，感谢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牛津大学图书馆、社科图书馆以及Jan Zielanka教授，Rosemary Foot教授，王林聪研究员所提供的资料及帮助。
- 2 也有学者将Chinese Studies译为“中国学”，而将China Studies译为“中国研究”，一方面指出“中国学”包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汉学”的一种扩展的称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指“中国语文”，尤其是大学里的中文系或中文学院；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学”和“中国研究”的含义限定性不强，在使用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划分也不太明确。见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5页。
- 3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政治也包含中国外交。
- 4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另外，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中，可称为“-ology”的学科在学术体制上已获得了合法地位。“Studies”最初则并不具有传统意义的学科地位，它更多地是一种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边缘地位。尤其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相当一批以“Studies”为名的跨学科研究实体，“当代中国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也是顺应了这一潮流的体现。见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 5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 6 Kjeld Erik Bro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n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8.
- 7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页。
- 8 Kjeld Erik Bro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n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8.

英国的大学是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力量。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就中国问题的研究重点开始转移到当代中国问题上。而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主要来自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集中体现在战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涉及中国研究的多份调研报告上。这些报告主要包括：1947年英国官方发表的第一份涉及中国学发展的报告-----“斯卡伯勒报告”（The Scarborough Report），⁹该报告主要促进了英国大学聘用母语为汉语的教师从事汉语及其他课程的教学，¹⁰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拓展中国学研究的范围奠定了基础；1961年发布的“海特报告”（The Hayter Report）进一步强调“历史、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系应该更多地注意亚洲、东欧和非洲的研究”，¹¹标志着在英国中国学学科地位的初步形成。而1986年的“帕克报告”（The Parker Report）则推动了英国的中国学向应用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从社会科学角度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大增强。而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正如德国中国学家托马斯·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所指出的：“70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大都是在经济利益的主导下进行的。¹²另一方面，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以及大洋彼岸的美国相比，英国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相形薄弱也是促使英国加强对当代中国问题研



究的动力之一。¹³

然而，囿于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大环境的影响，西方国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大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冷战思维，或者出现“一些著名汉学家对研究现实中国问题的学者的成果不屑一顾”的情况。¹⁴冷战结束后，这一情况则有所改变。同时英国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中国学研究的现当代导向以及多学科的定位。1999年英格兰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HEFCE: 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中国学评估小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学研究回顾”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中国学研究的落后已对英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影响，并建议英国的中国研究应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即包括语言；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专业领域¹⁵。

此后，分别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了“中国学研究回顾”颁布以来英国中国学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政府的资助下，中国学硕士课程在英国大学普遍设立，但仍集中在人文学科方面，社会科学的专业课处于边缘地位；同时对中国社会、政治和商业的研究也不足。¹⁶还有学者从英国汉学协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指出，虽然目前英国已有50所语言学校进行合格的汉语教学，但中国学教学（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英国学校中并未展开，认为中国学应在英国的全球化的未来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¹⁷

9 该报告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学研究，而是针对东方学、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滞后的现状，提出政府将在1947年至1952年给东方学和斯拉夫学提供专项资助等。

10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

11 HEFCE,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Report of HEFCE Review Group on Chinese Studies”, 1999, in http://www.hefce.ac.uk/pubs/hefce/1999/99_09.htm.

12 托马斯·沙尔平：“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历史与展望”，《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0页。

13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4页。

14 同上，第20-21页。

15 HEFCE,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Report of HEFCE Review Group on Chinese Studies”, 1999, in http://www.hefce.ac.uk/pubs/hefce/1999/99_09.htm.

16 Lina Song,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02 Overview”, 2002, in <http://www.lang.ltsn.ac.uk/resources/goodpractice.aspx?resourceid=131>.

17 Jenny Clegg, Chinese Studies in UK Schools: a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Ormskirk, Lancashire: Edge Hil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3, p.19 in <http://www.Bacsuk.org.uk/SchoolsReports.pdf>, pp. 8-24.

综上所述，二战后英国中国学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来自英国政府的引导和资助，而其背后则是以经济利益作为重要动机。冷战后，英国出现了更多强调当代中国研究的多学科性的要求。

二、英国大学主要的中国研究机构及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概况

冷战结束后，英国的中国研究，特别是现当代中国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从事汉学研究的重要大学通过新建、改建或扩建机构等方式来加强当代中国研究的实力，这主要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大学也出现了新建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的趋势，主要包括利兹大学、诺丁汉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而在上述这些大学中，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英国一直都有很强大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传统；以前，这个领域的许多学者主要集中于伦敦和一些传统大学，例如牛津和剑桥；而在最近10年左右，允许这些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的体制发展起来，并吸引了国际一流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¹⁸

牛津大学作为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最早开始进行汉学研究的英国大学之一。¹⁹从1995年以来牛津大学一直采取把现代中国研究分别放在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做法，但其研究重点已开始明确指向现代中国，包括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202008年5月，牛津大学成立了“中国中心”，其目标是“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及新的研究领域的需求，保证牛津大学在中国研究方面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²¹事实上，这是牛津大学将中国研

究方面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资源进行的一次有力整合，力图建立国际领先的中国研究基地。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面，2002年起徐维恩（Vivienne Shue）从康奈尔大学来到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并担任牛津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的主任。她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政治经济、政治历史。她关于“接触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与变革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被认为“更新了大西洋两岸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²²；她最近的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合法性、政府与新型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²³圣安东尼学院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主要学者的聚集地之一，还包括Steven Tsang对于香港、台湾问题的研究；Rosemary Foot对中国对外政策和人权问题的研究等。此外，圣十字学院的Rana Mitter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史的研究；Frank Pieke关于共产党党校系统和当前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等也是牛津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欧洲汉学研究重镇，剑桥大学在中国研究方面一直保持着传统汉学的主导地位。1994年，剑桥大学建立东亚研究系，下设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以语言、历史等人文学科为主，经济等社会学科为辅。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虽然剑桥大学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热情有所增强²⁴，但并未形成“牛津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遍及整个大学”²⁵的情形。

除牛津和剑桥大学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力量。亚非学院的前身是1916年建立的“东方研究院”，1938年改名为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二战后，在“斯卡伯勒报告”和“海特报告”的直接推动下，1968年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院”并接管《中国季刊》的出版工作。

18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 庞娟、王新颖编译: 《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19 1876年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担任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 (The Oriental Institute) 的第一位中文教授, 他被认为是第一位对英国大学中的汉学作出“真正贡献”的人; 而英国大学的第一个中文系则是1837年在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建立的。可见魏思齐 (Zbigniew Wesolowski SVD): 《不列颠 (英国) 汉学研究的概况》, 载《汉学研究通讯》, (总106期) 民国97年5月, 第45-52页。

20 魏思齐 (Zbigniew Wesolowski SVD): 《不列颠 (英国) 汉学研究的概况》, 载《汉学研究通讯》, (总106期) 民国97年5月, 第47页。

21 <http://www.chinacentre.ox.ac.uk/>

22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 庞娟、王新颖编译: 《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23 她撰写并编辑著作5部, 发表论文20余篇。最新的研究如 *Legitimacy Crisis in China?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eds P. Gries & S. Rosen), 24-49.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In http://www.csp.ox.ac.uk/staff_a-z_directory/staff-china/vshue124

24 如, 经济学家Peter Noian是剑桥大学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Hans Van de Ven则对中共党史有专门研究。

25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 庞娟、王新颖编译: 《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1992年，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与院内的当代中国研究院、《中国季刊》、早期中国研究讲座和中国研究生网络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²⁶目前，亚非学院有两位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学者Phil Deans 和Dafydd Fell以及一位从事中国政治史和林业政策方面研究的学者Julia Strauss被认为是继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之后的三位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同时这里也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台湾问题研究中心。²⁷

在伦敦，除亚非学院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作为英国“中左翼”思想的基地在中国政治研究方面也有几位重要学者：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学者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国治理的学者Jude Howell以及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Arne Westad²⁸。而从机构设置来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未出现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落在政治与国际关系、政府研究等各系或就某一专题的研究中心内。

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发布的“海特报告”不仅推动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的发展，而且也促使利兹大学于1963年建立中文系，后改名为东亚研究系，并强调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以及对现代中国的研究。2000年，利兹大学成立了中国商业和发展中心，该中心集中了东亚研究系和商学院国际商业中心的专家，以提供高水准的汉语和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商业的专门知识。²⁹2004年9月，东亚研究系与国际商业中心及其他系联合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其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经济及商贸。³⁰目前著名汉学家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任当代中国研究所主任，在他的领导下主要关注并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稳定问题。³¹

诺丁汉大学虽不是英国传统汉学研究的重地，但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却显示出重要的作用，其“当代中国学院”推动了“跨领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³²，该院还被认为是“除牛津和剑桥大学，伦敦以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心”³³。2003年该院建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这是“英国唯一的专门致力于分析重要的中国政策的思想库”³⁴，其目标是成为英国和欧洲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教学和政策分析中心。2005年9月郑永年任主任后，被认为“除了使诺丁汉大学在最近几年得到了来自金融团体和其他机构的资金支持外，还营造了英国当代中国研究复兴的景象”。³⁵

达累姆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已有50多年历史。1999年，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要开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和商业领域的研究，2004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移交政治系。³⁶在政府与国际事务系有两位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David Kerr 主要研究中俄关系和能源问题；Gordon Cheung作为《东亚季刊》的编辑，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及东亚国际关系等。

此外，在研究机构方面，还包括爱丁堡大学的亚洲研究学院，其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领域；威斯敏斯特大学1989年成立的民主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谢菲尔德大学199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主要涉及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曼彻斯特大学2004年成立中国研究中心；还有一些大学虽未设立专门的中国研究中心，但也开始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对现当代中国进行研究，例如格拉斯哥大学等。在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方面，主要还包括曼彻斯特大学的William Callahan关于中国与东亚关系、中国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华威大学的Shaun Breslin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等。

26 <http://www.soas.ac.uk/chinesestudies/>

27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庞娟、王新颖编译：《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28 同上。

29 <http://www.bacsuk.org.uk/DepartmentReportContent.html>

30 魏思齐 (Zbigniew Wesolowski SVD)：《不列颠（英国）汉学研究的概况》，载《汉学研究通讯》，（总106期）民国97年5月。

31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庞娟、王新颖编译：《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32 魏思齐 (Zbigniew Wesolowski SVD)：《不列颠（英国）汉学研究的概况》，载《汉学研究通讯》，（总106期）民国97年5月。

33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庞娟、王新颖编译：《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34 <http://www.nottingham.ac.uk/chinese/about/index.php>

35 (法) 让-皮埃尔·卡贝斯唐，庞娟、王新颖编译：《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36 <http://www.dur.ac.uk/politics/cccs/cccs.htm>

<http://www.bacsuk.org.uk/DepartmentReportContent.html>

三、英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特点

冷战后的20年间,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获得了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英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也在政府的资助和推动下不断拓宽和发展,其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研究的客观性的增强。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囿于冷战的大环境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都夹带着冷战思维,用敌对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由于不可避免地贴近政治时局,因此很难在冷战思维弥漫的环境下发表公允的研究成果。³⁷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情况得到改观,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关注视野更为宽阔和客观,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详细考察具体省份的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等。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和改革等宏观问题已不再是学者们关心的主要课题,对于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³⁸英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具有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一致的特点,虽然在天安门事件后对社会抗议和异议运动的关注成为新的焦点之一,但与美国学者相比,欧洲学者更为关注中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而不是预测它何时会崩溃³⁹。

其次,研究队伍的壮大。主要包括研究机构与研究学者的增加。总的来看,与美国、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英国一直是现代中国研究较为薄弱的国家⁴⁰,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英国强烈感到自己在现代中国研究上的落后,英国政府开始积极增强对中国研究的关注与投入。与美国相

比,英国的中国研究主要是在政府资助下启动的,而基金会的资助较少。而且,英国当代中国研究机构主要是在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之外建立的。此外,在英国还出现了建立校际中国中心的先例⁴¹。从研究学者的数量上来看,有学者统计英国的中国研究专家约为100名⁴²;另有学者统计,1993年,英国利兹大学17000名注册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人数达400多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⁴³但无论研究学者数量的多少,英国大学研究机构在吸引重要的中国当代问题(政治)研究专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为增强其影响力并进一步扩大研究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研究动机的短期性和局限性。如前文所述,由于英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并非汉学发展自然延伸的结果,而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客观条件下,为了保障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积极推动对当代中国的全面研究,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个非常功利与现实价值的中国研究传统”⁴⁴,因此,这一动机势必会影响其研究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从机制上来看,由于在经费上主要依赖政府和大学,私人 and 基金会的资助所占比例很小,这将会影响研究的长远规划;而且,即使获得了基金会的支持,在研究的客观性方面也会存在局限性。例如,近10年,英国对台湾政治的研究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得到了蒋经国基金会和台湾政府的资助。此外,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还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尚未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在内的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还需要一个不断调整其研究动机、完善其学科建构的过程。

37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21页。

38 Kjeld Erik Bro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n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8.

39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则不同,更为关注“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危机治理”等; Kjeld Erik Bro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n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8.

40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页

41 2007年7月,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共建全英高校中国研究中心,这是英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校际中心,其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

42 Kjeld Erik Bro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n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Prospects*, London: Routledge 2008.

43 Brian Hook, "Si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Base in Britain", in Hsin-chi Kuan(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okyo: the Center of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1994.

44 魏思齐 (Zbigniew Wesolowski SVD):《不列颠(英国)汉学研究的概况》,载《汉学研究通讯》,(总106期)民国97年5月。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¹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李亚兰

【摘要】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中印两国之间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在互相学习、研究对方的文化。印度对中国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各个方面。但是，语言、政治环境需要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意在简单回顾印度与中国文化交流历史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材料，同时综合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况进行梳理，对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研究重点、历史人物与研究机构等内容进行总结归纳。

【关键词】中国学 印度 中印文化交流 科研机构 研究重点和特点

一、“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概况

中国学者对印度的研究则由来已久，从往来贸易活动中的零星提及，到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详细的记录；从对佛教的研究和传播到对印度教古代经典《五十奥义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的翻译出版；从对人文风情、宗教哲学的关注到对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之广、著述之多，可谓是繁花似锦。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对印度汉学的研究，则很长时间以来未被重视。随着海外汉学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印度人“如何看待中国和吸收中国文化”这一课题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应的介绍工作也逐步展开。根据收集的资料，国内关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可总结如下：

1) 从研究成果来看：论文较多，著述较少。近年来，国内学者相继关注这一课题并发表了论文。但总体来看，发表的论文较多，而专注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状况的著作则相对较少。季羨林先生的《中印文化

交流史》、薛克翘先生的《中印文化关系交流史》中均论及中国文化在印度的传播，但所占篇幅有限，更多的是从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角度，叙述中印文化的交流历史；深圳大学文学院郁龙余教授等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对印度作家影响的角度展现中印间的友好交流，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和影响的著述之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尹锡南研究员的《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20世纪印度与中国文化》、《一百多年来印度对中国认识的复杂变化》《新世纪中印学者跨文化对话：印度学者访谈录》等系列论文，印度学者H·P·雷易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的论文《印度学在中国》、B·坦克哈先生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山佳译）的论文《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正在改变的范式》、M·莫汉蒂先生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的论文《中国学研究：印度学者的观点》以及其他印度学者在国内相关学术活动中的发言等等，是这一课题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线索。

2) 从学术活动来看：国内的汉学研究机构、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开始逐渐关注这一课题。关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在国内外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中出现了印度学者的声音，如：2007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国际研讨会上，有印度学者关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的发言；2008年3月于德里India Habitat Center 与台湾大学联合举办的“印度的中国研究”研讨会上，有印度学者对当前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做了简单介绍，研讨会还决议展开一个“印度的中国学研究（China studies in India）”的科研项目，对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成果。

这一课题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总之，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互相学习的愿望更加强烈，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在印度被传播、研究和接受，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从而为更好的发展两国关系做出参考。国内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处在不断上升的阶段，相信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参加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之中。

二、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发展阶段及成果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和中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历史紧密相连。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始自远古，到汉代活跃起来，直至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佛教的传播而达到鼎盛状态；伴随着佛教的衰微，到宋元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进入萧条时期，明代之后中印文化交流逐渐复兴，虽难有盛唐时期的繁盛景象，但也进入涓涓细流之境；20世纪之后，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印两国的共同命运使中印友谊在20世纪前半叶得到极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思维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困扰着中印关系，1962年中印之间因领土争端爆发战争，之后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受政治氛围的影响转入低潮，但两国之间互相研究的热情却得以升温。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顺应两大文明古国发展的需要，中印友谊逐步深化，中印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印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也进入了更加多姿多彩的阶段。

基于文化交流史而进行的印度中国学研究，受文化交流的不同阶段、方式和内容、两国关系的发展、政治环境、史料存留等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和近现代有明显不同的发展特点，以下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对其阶段发展特点和成果进行描述介绍。

（一）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模式下的印度中国学研究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始自远古，具体古到什么程度，用季羨林先生的话来说，是“详细年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了”。有迹可循的是，约在公元3世纪以前，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有关于中国的记载，称中国为“Cina”（即“秦”的音译），此后，在印

度著名典籍《摩奴法论》及另一部大史诗《罗摩衍那》中，也多次出现“Cina”这个字。而中印交流有正式记载的开始，见于汉代《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大宛列传》中，其间将印度称为“身毒”，并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四川的产品已经传到了印度。除此之外，《汉书》等中国古代经典中，均有相当多关于印度的介绍，《后汉书·西域传》中甚至专门为天竺做传。文献记载之外，古代中印交流史上最重要的通道“丝绸之路”也是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造纸术、钢、罗盘、中药、火药等传入印度，而印度的制糖术、玻璃等也传入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大量佛经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宗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成为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和载体，佛教的传播一方面增加了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元素，另一方面来华的印度僧侣及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印度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这其中，从结果来看可循迹到印度中国学研究事件上的有如下几项：

1. 印度高僧和佛经翻译

佛教兴盛时期，大批印度高僧来华，他们中的许多人通晓华文，为佛经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来无回，但是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角度讲，他们是最早近距离接触并研究中国文化的主体。通过他们翻译的佛经，或多或少被烙上了佛教在中

国和中国文化融合后的痕迹，作为载体在佛教回流后也对印度造成了影响，促进了印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其中，有著名的僧人鸠摩罗什等，不仅翻译了大量佛经，并创作了《法相论》，还培养了大批在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弟子，可以说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先行者。



2. 法显及《佛国记》对印度中国学研究的贡献

法显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也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运动中为求佛法而成功到达印度的第一人。自公元399年到公元409年，法显自陆路进入印度，到达北天竺，后南下自至东南渡海到今斯里兰卡，再经由海路回中国。法显西行求法，不仅促进了大乘教义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他记录自己印度行程的著作《佛国记》作为重要的历史典籍，被译成英文后，在印度产生了极大影响，被认为是研究印度中古历史不可缺少的材料。

3. 玄奘及《大唐西域记》与印度中国学研究

中国西行求法的诸多高僧中，以玄奘在印度的影响最为巨大，几乎妇孺皆知。玄奘西游印度，归而做《大唐西域记》。玄奘的这本书记述128个国家和地区的都城、疆域、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生产生活、物产风俗、宗教信仰，此外还记述了其他十余国家的情况，是继晋代法显之后又一游记巨著。玄奘西游是受唐代官方派遣而成行的，因而玄奘这次西游沟通了中印官方之

间的信息，促进了印度统治阶层对中国的了解。同时，《大唐西域记》虽说是中国人研究印度的记载，但是，由于其中史料详尽，成为印度重建印度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因此，玄奘及《大唐西域记》成为印度学者专家们研究不能忽视的资料。作为中印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玄奘取经的故事在印度广为传颂，甚至被写进了小学课本，这也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表现。

4. 关于“请老子像”和玄奘“翻唐为梵”的记载

在《旧唐书·天竺国》中有一段记载：“有迦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新唐书·西域列传·天竺国》中同样记载：“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

而与老子、《道德经》及印度相关的，还有如下记载：“上令翻《老子》为梵文，以遗西竺。师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且老子立义肤浅。五竺闻之，适足见薄。’遂止。”《佛祖统

纪二十九·玄奘》

这段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难得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传往印度的记载，经季羨林先生考证，认为玄奘确实曾将《道德经》的正文翻译为梵语，但序言未翻。然而，无论《道德经》是否被翻为梵语并在印度传播，“请老子像”和玄奘将老子的《道德经》“翻唐为梵”的记载均证明，古代印度对中国圣哲老子其人及道教的关注和求教却有其事。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古代印度中国学研究的线索之一。

5. 义净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印度中国学研究

义净与法显、玄奘一起，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最有成就的三位僧人之一，他在印度呆的时间比玄奘还长。虽然他在印度的影响没有玄奘大，但对印度中国学研究亦有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创作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经西方学者传播后，被印度学者Latiha Lahari全译为英文，在印度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²

2 季羨林著：《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P87页。

此外，除经贸易通道互相交流的物质文化和经由佛教交流的精神文化，为政治目的或扩展贸易关系而通过政府派遣的使节互访也是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内容。这其中，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达印度为例，郑和的船队到达印度南部海岸，不仅带去了中国物产，还在当地留下了中国渔网和捕鱼的技术，并立碑文纪念对印度的访问，为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贡献。

总结这一阶段的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我们发现，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兴趣和内容集中在对文化交流渠道的开拓和对佛教的研究与传播上，与这些主题相适应，印度对中国的了解也集中通过往来的商贸活动和僧侣使节来实现。尽管文化交流热热闹闹，但归结到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这一主题上，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关于中印之间的古代文化研究，往往会得出“我们研究别人多，别人研究我们少”的粗略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印度古代各邦国历史感较差，缺乏可信的史料记载，可见的文字记载资料较少；另一方面，古代印度分裂大于统一的政治状况，各邦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古代汉语等因素既对古代印度了解中国文化造成困难，也对我们掌握资料造成了障碍。这种种因素，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度中国学造成难度。如同季羨林先生在谈到中印文化交流时说到的：“我一直反对中印文化交流单向论，但由于印度史料的缺乏，造成中印文化关系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在印度传播和影响研究的难度。”³

（二）近代以来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主体为印度人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近代。最早的记录应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随英国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士兵，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印地语写成日记，回印度后，以《在中国的十三个月》为名公开出版。这本日记成为近代以来印度研究中国的宝贵资料。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和中印两国的解放和独立，中印两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着巨大挑战，致使两国的文化交流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印度中国学研究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以下将按照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介绍。

1) 1962年以前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预示着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开始，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开始，新中国的建立及印度的独立，又将两个具有相同命运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早期的中国学研究，最初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探索印度及其邻国的文化联系的渴望，这种情形既提供了一种在殖民主义框架之外形成新的关系并批评西方殖民主义的机会，又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后殖民秩序下的选择。”⁴ 1962年以前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基于这种背景下展开，主要以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研究传统为主，研究集中在对中国佛教、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中印文化关系等领域。

著名诗人泰戈尔是近代1962年以前印度中国学研究的推动者。1918年，泰戈尔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第一个开设关于中国语言的课程，这标志着中国学在印度的真正兴起。1921年泰戈尔成立国际大学，并于1937邀请中国学者谭云山先生在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尽管泰戈尔本人没有出版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著述，但是其作为著名作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悟。1924年访问中国期间他在演讲中多次引用了中国道家的经典和唐代诗歌的词句，可以窥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正是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才使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在国际大学得以展开。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后，成为近代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中国学院成立后开设多种语言课程，包括汉语、藏语，同时开展六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中印佛教对比研究、中印其他宗教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及中印文化研究等，共出版中英文及其他语种著作34部，发表论文100多篇⁵。通过中国学院，许多印度青年被派到中国进修学习，这些人后来多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可以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代表了1962年以前特别是印度独立以前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中国学院的诸多学者中，最著名的就是师觉月。师觉月原名巴克齐（P.C. Bagchi），1926年他在法国以《中国佛教圣典》为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被中国学者称为是“印度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师觉月先生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博士论文外，还有《印度--中国丛书》、《印度与中国：千

3 郁龙余等著：《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P2页。

4 《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正在改变的范式》，P75页。

5 赵守辉：《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汉学研究及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1期，第106页。

年文化关系》⁶、《菩提伽耶的宋代中文碑铭考》（合著）、《密教研究》等。其中，《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被当作是印度中国学院学生的教科书，其中对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印度来华的佛教使者、中国访印的高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况、中印两国的文化差异等都做出了介绍。尤其重要的是，在这本书中，师觉月先生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并从古代贸易往来、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影响以及老子道家哲学对印度的影响等方面阐释了他的观点。

中文学院另一个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就是谭云山先生。谭云山先生虽未入印度籍，但其在印度进行的中国文化、文明的研究和传播，是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谭云山先生1928年9月应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教学之余，出版发表大量关于中印文化关系的著作，其中包括《中印间的文化交流》（1937年）、《当代中国佛教》（1937年）、《中国现代史》（1938年）、《中国与印度》（1938年）、《什么是中国宗教》（1938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中印文化学会》（1944年）、《亚洲间文化合作与亚洲联合》（1949）、《中国文明与中印文化精神》（1950年）《中国语言文学史》（1952年）等等。谭云山先生被誉为是“现代玄奘”，对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来说，他可称得上为奠基者。

除以中国学院为中心的中国学研究之外，1962年以前，印度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以及政府官员等对中国的关注及论述，也成为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主要有：

罗摩·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 1772-1833），印度现代改革第一人，被称为“印度近代之父”。他在一篇题为《传教士和三个中国信徒的对话》的文章中，描摹了中国人的机智，得出结论说没有上帝，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⁷，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尊崇。

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被尊为“印度国父”的他对中国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06年就写了《中国情况的变化》一文，在1924年7月24日的《青年印度》杂志上，又发文声讨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同情中国的处境。甘地对中

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影响了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印关系的发展，中国学院的成立之初，甘地表示非常赞同，他对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作为国家元首，尼赫鲁不仅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推动者，他本身也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了解。他曾先后写过《印度为什么支持中国》、《新中国》等文章，在他著名的作品《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还有专门的一章《中国和印度》，论述了中国文化、中印文化关系发展的必要性、影响中印文化交流的因素等问题。近代印度的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尼赫鲁的推动下展开的。

K. P. S.梅农（K. P. S. Menon 1898 – 1982），印度著名外交官，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外秘。根据其在中国的经历，著《德里-重庆》⁸一书，对中国进行了介绍。同时，他还在系列讲座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中国的过去和现状》⁹一书，书中既有关于孔子、郑板桥等古代中国文化的介绍，也有关于毛泽东等现代思想家的介绍。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的黎明》，发表于1972年，书中有关于“泰戈尔与林语堂”、“中国文学中的爱”、“与孙中山夫人的谈话”等等内容，在印度的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拉达里克里希南（Sarvalli Radhakrishnan, 1888 – 1975），他是现代印度著名学者，后于1962~1967年担任印度总统。1944年，他以学者身份访华讲学，以其讲学内容为基础，他于1944年出版了《印度与中国》一书，从中国的教育传统及哲学思想的角度介绍了中国文化，并论述了中印文化的异同及相互交流。

这一时期，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也是独立后印度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师觉月先生翻译了道宣的《释迦方志》，L·拉希里翻译了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S·P·查太吉则从法文翻译法国汉学家M·S·列维的《王玄策在印度的使命》（Les Missions de Wang-Hiuen-Ts'e dans l'Inde）。这些资料典籍的翻译为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养分。

这一时期的印度中国学研究，还有其它一些印度学

6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Sina-India Cultural Contact*, Calcutta: China Press Limited, 1944.

7 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第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

8 Menon, K. P. S., *Delhi-Chungking* Oxford Univ. Press, Bombay, 1947

9 Menon, K. P. S., *Chin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8.

者的文章，这里不一一列举。在印度学者的论文中，1962年以前的印度中国学研究被称为是Shantiniketan运动¹⁰。作为近代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第一阶段，它被描述为带有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对邻国文化了解的渴望以及对相互之间文化关系的了解和研究是其主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尼赫鲁的推动下，印度以德里大学为中心，广泛展开了对中国的研究。这其中，对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的革命道路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表现出与这一阶段前期不同的特征。如印度历史学家Girilal Jain所著的*What Mao Really Means, India Meets China in Nepal*，以及Asoka Mehta所作的*China, the Pathfinder?*等著作。这些著述开创的学术传统在1962年以后的印度中国学研究中得到延续。



2) 1962年后的印度中国学研究

1962年是中印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极其微妙的国际形势下，刚刚还处在蜜月期的中印两国由边境问题产生的争论而逐渐升级到兵戎相见。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不和谐音符，然而战争也并未完全阻断中印文化交流与对话，反而促使中国学研究在印度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的印度中国学研究在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上均发生了重大转变，概括起来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表现在研究方向上，出于变化的中印关系及政府培养中国问题专家的考虑，印度的中国研究由前一个阶段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关注，转向了对中国历史及历史运动、现代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印中关系、印中现代化进程比较和政治经济发展理论比较的关注上。

其次，区域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模式。60年代中期，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度走向了亲美路线。美国福特基金会组织对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提供的帮

助，在促进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方向的选择。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学者前往美国从事研究并返回印度大学任教，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特点也具有很强的美国特征，即集中关注区域研究领域，主要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及外交政策。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一度成为热点。受政治环境的影响，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吸引了大学里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等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主题。

第四、自1962年到1978年，中印之间的学术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自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后，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逐渐频繁，学者的研究兴趣也逐渐开始分散，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相关的研究著述涉及到文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

在以上特征影响下，这一时期印度中国学研究的代表成果简介如下：

历史政治领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印度学术界1962年前后印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书，如《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十年：当今中国的生活思想扫描》（1960年，孟买永恒出版社）、《今日的共产党中国》（1961年，孟买亚洲出版社）等等；中印战争爆发后，大量火药味极浓的政治书籍也相续出版，如《我们接受中国挑战》（1962年，尼赫鲁）、《中国侵略及其含意》（1963年，K.M.曼西）、《中印冲突的政治》（1973年，M·拉姆）、《和平之路：中印边界争端研究》（1983年，T.S.穆尔提）、《中印边界问题论战》（1985年，D·K巴纳吉）等等不一而足；关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作品，代表性的有G.P.戴希潘迪（G.P. Deshpande）的《中国的文化大革

10 Report on The AAS One-day Workshop on "China studies in India", India Habitat Center, New Delhi, 6th, March, 2008

命：来自印度的观察》（1971年）、德里大学M·莫汉蒂教授的《毛泽东政治哲学》（1979年）、贝拿勒斯大学任嘉玛·希教授（Kamal Shee）的《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89年）、斯瑞麦蒂·恰克拉巴尔蒂（Sreemati Chakrabarti）的《毛、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1998年）等等；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也比较多，代表性的有G.P.戴希潘迪和H. K. 古普塔合著的《反帝联合阵线：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1986年）、任嘉德（C.V.Ranganathan）所著《“潘查希拉”与未来：印中关系透视》（2004年）等。

经济发展领域：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的发展道路是印度学者关注的经济领域的重要课题，著名学者白雅蜜（Mira Sinha

Bhattacharica）将毛泽东和甘地进行比较，将中国的农村公社与印度独立后废除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进行比较，发表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见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印度研究中国的重要方面，1999年，德里的中国学研究核心机构印度中



国研究所成立专门的经济研究小组，重点关注当代中国经济、印中经济发展之比较以及印中双边经济关系的重大课题。以成立于2008年的清奈中国研究中心为例，其下所属的印度学者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有几十篇之多，由B.Raman所发表的《中国经济观察》（Chinese Economy Monitor）系列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

文学、宗教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古典、近现代和当代文学。近现代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对鲁迅文学的研究。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的马克尼先生是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除

鲁迅外，还有印度学者对中国现代作家如茅盾和巴金等人进行专题研究。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侄子A·N·泰戈尔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1918——1937》。谭中的夫人、华裔印度学者黄漪淑女士除了研究中国古代俗文学中的变文外，还研究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现象及当代中国诗人臧克家。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邵葆丽女士从后毛泽东时代入手，从文学思潮到具体作家进行了广泛论述，代表论述有《1976年到1989年间中国文学“百花齐放”的再现》等。宗教方面德里大学教授K·P·古普塔博士专门对康有为与印度宗教改革家辩喜进行比较研究，填补了印度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点。

此外，延续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学术传统，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后仍为许多学者所坚持继承。以谭中先生为例，1978年他出版了《中国与美好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继续研究中国历史；1994年又他主编了一期具有特殊意义的《印度视界》，这期

刊物邀请了当代中印两国著名专家学者撰稿，还刊登了泰戈尔、尼赫鲁、季羨林、袁水拍等人的文章或诗歌。该期杂志设“泰戈尔与中国”、“尼赫鲁与中国”、“谭云山与中国”、“亚洲巨人们的未来”和“理解对方”等十多个专栏，继续通过文化、文明的传播促进中印双方的心灵对话；1998年他主编了《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印度寻求理解中国》一书，该书将视野延伸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全部由印度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撰稿，也刊登了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的文章或回忆录；2006年，谭中先生与耿引曾教授合作出版了中文版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该书同时以英文形式在印度出版，为印度中国学研究再添硕果。

三、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学术中心及主要科研机构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主要依托重要学者、带有学院

性质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得以展开，因此，在细述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况时，有必要对重点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其主要学者进行概述，这些研究机构和主要学者，是我们搜集印度中国学研究概况资料的重要线索。

在印度大学中，围绕中文教学展开的中国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所大学之中，分别为：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泰戈尔创建的国际大学、位于圣城瓦拉纳西的印度教大学。此外，由各个大学中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组成的各个科研院所、文化研究中心，也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

（一）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ICS）

中国研究所是印度一所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权威学术机构，代表着印度中国学研究的一流水平。

中国研究所起源于中国研究学会。中国研究学会是印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印度经济增长协会、印度防御研究与分析协会等其它设在德里的研究协会中的中国研究专家们共同发起的非正式学术论坛。该论坛成立于1969年，每隔两周主办一次，与会者就当代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该论坛还协助承办印度唯一的关于中国和东亚问题研究的杂志《中国述评》。1978年，《中国述评》杂志编辑部迁至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并成为论坛的主要杂志，由此，论坛的活动中心也集中在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1990年，随着论坛活动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建立相应的学术研究体制，鼓励学术活动的开展，并进一步促进印度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中国研究学会决定在其基础上建立中国研究所。

印度德里中国研究所代表了印度对中国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来自印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及其它科研机构的顶级学者们，是其会员的主体组成人员，此外，印度外交部一些受人尊敬的前外交家们也参与其中，成为其成员。中国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及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心最主要的常规活动是每周三主办一次研讨会，就涉及到中国的不同研究课题展开讨论。作为印度中国研究的主要科研机构，印度德里中国研究所通过科研活动，出版学术杂志、期刊以及在报纸上撰写关于中国现代发展现状的文章等各种方式，为印度人民持续的提供了有关于中国的主要知识。



中国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为持续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在研究所内外，通过支持、发起科研项目的方式促进印度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系统化。作为这一构想的支持，研究所提议，通过建立一个收藏有中英文资料的图书馆和涉及相关领域学术资料的数据库，普及关于中国的知识，促进信息的交换，扩大学术成果的影响与分享。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所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包括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和书刊、组织科研培训以及积极展开国际合作等等。目前，该研究所的主要科研项目为东亚研究项目、中国经济研究项目以及比较研究项目。

（二）防御研究与战略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Strategic Analyses, IDSA）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军事等，研究人员主要有中国观察家K.N. Ramachandran, Sujit Datta, Jajor General等人。研究成果通常发表在研究所出版的学报《防御研究》（Defence Studies）上。

（三）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IAIC）

该院藏有大量和佛教以及印度文学与文化相关的藏文、中文、蒙文资料。由著名学者Raghuvira博士创立，在其子Lokesh Chandra博士的领导下，成为一所重要的研究机构。虽然是私立的，但仍吸引中国古典研究领域中的印度及外国学者。

（四）甘地夫人国家艺术中心东亚部（East Asian Section, Indira Gandhi Center for National Art）

研究古代中印两国接触的重要研究机构。过去十年内，从尼赫鲁大学退休的谭中教授以荣誉教授及顾问的身份应聘至此，在他的带领下执行了许多研究计划，召开了多次研习会。

(五) 清奈中国研究中心 (Th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CCS)

清奈中国研究中心由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成立于2008年4月,是一家非盈利的智囊机构。该机构的研究目标包括:与印度发展相关的中国发展研究课题的深入研究;中印经济和贸易关系的研究;中印边境问题及中巴关系的研究;东盟问题的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远景及其对印度及世界的影响研究等等。主要目的在于为印度特别是南印度政府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提供参考,为中印学者提供对话平台的同时为印度的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便利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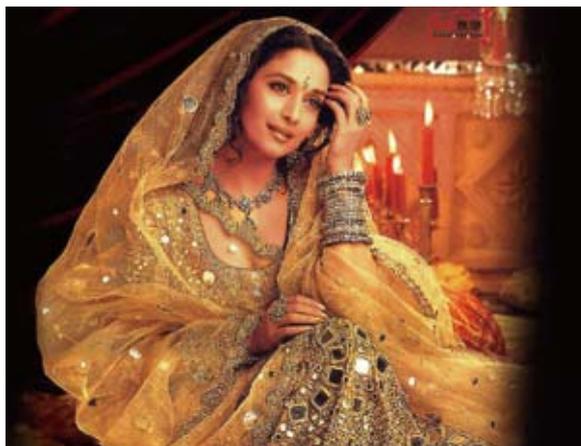
四、印度的中国学现状特点及思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印度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基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发展迅速。因为史料的缺乏,对印度古代可能存在的中国学研究,现今无法考证查实。但近现代的印度中国学研究则展现出深入、繁盛的局面。尽管近现代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丰富的论著在这里不能一一尽举。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未曾中断,两个东方大国间一直保持着互相了解、研究的期望。

纵观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发展概貌,可以发现,就其发展历程来讲,有以下特点:1)就其阶段而言,呈现出古代重宗教哲学思想、社会文化、人文风情研究,到近现代重视社会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文学艺术研究等特点;2)就主体而言,呈现出由个人行为、学术行为,转向政府行为、政治外交需要的行为至学术兴趣为主驱动力的特点;3)就其研究领域和内容而言呈现出由

简单到多样,范围逐渐扩大,内容逐渐深入的特点。但相对来说,印度对中国古代文化,如中国哲学、宗教等传统文化的关注不是非常充分。近现代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比较多的集中在政治学、外交和经济发展领域,对近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关注还不是非常多。

此外,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还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谭云山先生和谭中先生父子两代可以说是印度中国学研究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而一些中国学研究实力比较雄厚的科研机构,也与国内科研机构及学者进行了比较好的互动。其次,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中,除少数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精通汉语的学者之外,大多数学者特别是政治、外交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并非从汉语资料



展开对中国的研究,他们更多的是从英语资料入手,获取研究中国所需的信息。精通汉语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往往更重视从传统文明、文化入手,而从英语获取资料的学者,往往更多集中在区域研究、政治外交战略研究等领域。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以上特点显示,如何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增强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印度的吸引力,通过真正意义上心灵的交流实现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共同发展,将成为中国文化传播在印度需要关注的重点。而继承印度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通过汉语的传播及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向印度提供更多了解中国的可能,在未来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专著：

1. 季羨林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
2. 龙余等著：《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薛克翘著：《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8年1月。
4. 谭中著：《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

论文：

1. 薛克翘：《近五十年来我国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综述》，《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2. 尹锡南：《尼赫鲁眼中的中国文化》，《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
3. 尹锡南，朱莉：《印度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1期。
4. 尹锡南：《二十世纪印度与中国文化》，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3期。
5. 【印度】M·莫汉蒂著，山佳译：《中国学研究：印度学者的观点》，《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6. 【印度】B·坦克哈著，张燕晖译：《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正在改变的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7. 蓝建学：《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意义与对策——“中印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8. *Report on The AAS One-day Workshop on "China studies in India"*, India Habitat Center, New Delhi, 6th, March, 2008.
9. 郁龙余：《中国学在印度》，《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10. 尹锡南：《一百多年来印度对中国认识的复杂变化》，《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3期。
11. 张勉励：《印度的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9期。

网页：

1. <http://www.icsin.org/index.html> 2009年3月10日
2. <http://www.c3sindia.org/> 2009年3月10日
3. <http://www.idsa.in/> 2009年3月10日

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研究文献的调查研究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譙燕 徐一平 马玉萍 宁民治 秦琪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余年文化交流的历史。在世界各国中，可以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起始最早，经历的时间也最长。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研究主要对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文献作一个全面的调查，以期把握各阶段的概况及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有30余年，我国的日本研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日本研究的书籍论文也由少到多，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比此前有较大的飞跃。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为尽快实行现代化，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日本作为我们的近邻，经济发达，现代化程度高，因此，与日本之间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及合作逐渐增多，这也为我国学术界从各个领域、多种角度对日本进行研究提供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共创办了几十种日本研究杂志，其中绝大部分是近30年来创办的，既有各日本研究

机构的研究刊物，也有全国或各地日本学会的杂志，还有部分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各类日本研究杂志给学界对日本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交流阵地，使日本研究的水平得以快速提高。

近30年日本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了解和掌握我国出版的有关日本研究的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大致情况，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相关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随后，又对收集到的资料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语言文字、教育、文化艺术、综合等十个领域进行了分类整理。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日本研究论文25100篇，据我们统计，经济类居首位，共7321篇，占29.17%，文学类次之，占11.92%，政治法律、文化艺术类各为9.96%和9.86%，这组数字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日本研究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凸显出我国的日本研究主要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心这一重点。具体数据请参照表1。

表1 近30年日本研究论文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年代	哲学	政治法律	经济	社会学	文化艺术	教育	语言文字	文学	历史地理	综合
79年-83年	67	65	161	40	65	37	179	225	108	45
84年-88年	68	85	288	84	148	117	221	318	169	68
89年-93年	76	220	606	112	273	202	194	340	259	91
94年-98年	82	593	1574	229	520	502	365	477	435	157
99年-03年	120	847	2477	454	709	576	588	857	747	348
04年-08年	361	687	2015	372	770	749	492	775	603	498
合计(%)	774 (3.08)	2497 (9.96)	7321 (29.17)	1291 (5.14)	2475 (9.86)	2183 (8.70)	2039 (8.12)	2992 (11.92)	2321 (9.25)	1207 (4.80)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本研究的内容较之此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的研究逐渐深入、系统，而且跨领域、多学科的研究也不断增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经济研究，从80年代初期，关于日本经济问题的论文激增，大多研究的是日本战后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探讨其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政府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等，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例如，《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资金是如何解决的》、《日本现代化:速度和效率剖析》、《日本战后的经济计划和经济变迁》、《日本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日本财政体制及其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不过，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经济研究还比较零散，未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日本语言研究仍然势头不减，延续了70年代的研究热点，其论文的数量也超过了日本经济研究。

8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展开，研究日本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许多杂志还出版了专刊，专门发表有关日本经济研究的论文，论文内容涉及到财政、金融、物流、工资制度等等，其中不乏著名经济研究专家的文章，研究水平较高的也比较多，并愈益充分地吸收国外经济研究的新成果，涵盖的范围非常广。80年代中后期，日本文化研究、日本历史研究等急剧升温。同时，伴随着学习日语的热潮，日本语言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也更加多样化。



90年代初期，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开始出现萧条，经济研究论文中出现了许多对日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进行反省的题目，对日本的研究更加客观，研究观点也更加务实。例如，《论日本目前经济的衰退与发展趋势》、《论日本的经济萧条》、《浅析日本的经济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日本“泡沫经济”的前因后果》等论文着重考察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阐述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也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和学术观点，引起人们的共鸣。

9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依然萧条，政局更迭变动，日本经济研究尝试着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探索可供我国经济发展参考的经验或教训。这一时期，对日本政治形势、政治制度等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论文也大幅增加，从理论研究到现实研究，不仅研究领域广阔，而且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朝纵深发展。特别是中日关系或中日关系史研究，视点独特，研究深入，出现了许多水平很高的学术成果，并且在国际国内各种学术评奖中多次获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日本政党体制转换的社会成因》、《全球性问题与日本的大国外交》、《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意义、图式和框架》、《试析当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政治》、《战后日本政治的大众化趋势》等文章对日本政治及外交的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也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

2000年以后，日本研究更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文学、语言等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其中，文学研究除经典名著研究、作家研究仍然是重点外，日本的动漫研究、大众文学研究等也受到普遍的关注，研究成果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例如，《浅谈日本动漫对80后文学的影响》、《从〈犬夜叉〉看日本动漫经典的形成——兼谈我国动漫能动性》、《“普罗”还是“通俗”？——“大众文学”的两副面孔》、《大众文学的“民众欲望”表达及其艺术性——“文艺组织生活论”与日本左翼的“文学大众化”争论》等文章对大众文学的特性及动漫的影响等进行了剖析，受到好评。另

外, 日本语言研究也渐成规模, 从理论体系的研究到实例研究, 从单一语言的研究到对比研究, 以及从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等等, 研究内容丰富, 研究视角新颖。特别是日语语法研究, 比起日语词汇研究、语音研究来, 论文的数量更多, 研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目前, 日本研究进一步向多领域、跨学科方向深入, 这种趋势势必推动其向更高一个层次发展。

与日本研究论文相同, 日本研究著作中数量最多的仍然是经济类的研究, 达到总数的约30%, 政治法律类研究及文化艺术类研究次之, 也都接近20%, 文学类研究也不少, 超过了10%, 可见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研究著作, 最为关注的领域基本相同, 都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例如, 经济类研究中, 《日本的信息产业及其政策》、《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思考》、《日本财

政政策》、《日本商法论》等对日本经济政策或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专著比较多, 从中能看到学界所关心的核心所在。文化类研究中, 如《林罗山与日本的儒学》、《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现代日本大众文化》《日本的民俗宗教》、《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中心》、《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等文章, 探讨儒学、佛教、宗教、大众文化、日本近世国学思想等等, 涉及到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政治法律类研究中, 探讨日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以及政治与外交的著作比较多, 如《日本政治史》、《日本政治制度》、《日本现代行政法》、《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等等, 大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研究。研究著作的具体数据请参照表2。

表2 近30年日本研究著作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年代	哲学	政治法律	经济	社会学	文化艺术	教育	语言文字	文学	历史地理	综合
合计 (%)	57 (2.70)	401 (19.04)	618 (29.35)	152 (7.22)	390 (18.52)	94 (4.46)	106 (5.03)	216 (10.25)	35 (1.67)	37 (1.76)



现阶段,本课题的主要工作是信息汇总, 并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因时间有限, 没能对资料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但已达到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此后,我们将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并编辑成册出版。

本调查报告不仅能使人了解我国日本研究的历史, 同时也能了解到日本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情况, 可给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可借鉴的经验, 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另外, 在国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的日本研究论文或出版的著作也不在少数, 今后准备对这一部分进行收集和整理, 以此对我们的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21世纪初的中俄地区间合作：成就、问题与前景

俄罗斯联邦拥有80多个主体，每个主体都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开展国际合作。其中，与中国保持着一定联系的主体占全国主体总数的2/3。如今，虽然俄罗斯还没有像美国、日本和西欧一样成为中国政府合作的首选，但是中国对其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并且把与俄罗斯的合作看作是未来的一种战略储备。

近25年来，中俄在各方面都加强了不同深度和广度的交流，两国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俄地区间合作作为两国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对中俄地区间合作的已有成就、现存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认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成就

所谓中俄地区间合作，是指国家间联系以外的、没有莫斯科和北京直接参与的各种交往。回顾中俄地区间合作的发展进程，其取得的成就如下：

第一，中俄地区间合作使中俄双边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俄开展地区间合作的重心是地理上邻近的地区，就参与者的数量和构成来说，这些交往的规模是空前的。每年都有上百万人通过边境地区的国境站出入中俄两国。近年来，一些俄罗斯退休人员甚至迁往中国边境地区定居，便宜的房价、较低的生活费和通货膨胀水平以及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鼓励性措施会使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中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非正式交往，中俄关系的发展超越了政治和经济，真正从国家间的交往变成了文明间的交往，中俄边境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环境，年轻一代对中俄关系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第二，地区间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国家间交往的内容和形式通常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地区间交往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交往的个性化。

第三，俄罗斯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交往已



经为俄罗斯进入东北亚地区奠定了现实基础。如今，远东地区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空间的一部分，而中俄边境和地区间的交流对远东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交往防止了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经济崩溃。如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食品、日用品和劳务等方面的合作也为保障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条件。同样，对中国来说，中俄地区间的合作有利于中国边境省份的经济振兴。目前，中俄贸易已逐渐扩大到中国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

第四，与中国开展地区间合作是俄罗斯预防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的不断升温，两国边境居民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2006年在滨海边疆区年轻人中做的一个调查显示，1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策会威胁到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5%的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前景不容乐观，而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俄关系前景非常乐观，其余则认为较为满意。这是俄罗斯边境地区人民对俄报刊中“中国扩张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击。调查表明，尽管中俄两国在文化和民族性格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但是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年轻人已经把中国当作客观存在的现实来接受，并且认为要尽可能与之和睦相处。

二、问题

中俄地区间的合作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地，也带来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今，像边界勘定、易货贸易、大批非法移民等影响中俄边境关系的传统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则日渐突出。

在中俄地区间的合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区间交流与国家间交流缺乏应有的协调。在地区交流内部也缺乏同步性。地区间交流的一大特点就是自发性，没有中央的协调和指引。这既是地区间交流的活力所在，也是其发展的致命弱点。典型的例子如下：

第一，俄罗斯边境道路状况较差。中俄边界东段总共有19条边境公路，关于改造这些道路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现在中方境内的相关公路已全部完成改造，但俄方大部分道路的技术状况仍未达到临时使用的要求。

第二，海兰泡地区的跨阿穆尔河大桥至今仍未建成。早在1995年6月26日，即李鹏总理访问莫斯科时，中俄政府就签订了建造大桥的相关协议。1997年11月，俄罗斯政府明确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战略，其中包括为在海兰泡和黑河附近建造跨阿穆尔河大桥进行勘查。但

是，由于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缺少有效的沟通，至今大桥仍没有竣工。

第三，在边境地区建设工业贸易综合体的计划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中方想通过这一计划建立一个面向俄罗斯的大型贸易基地，以便管理倒爷业务并提高边境地区的就业率。俄罗斯边境区的领导层则试图以此限制中方企业在边境区的商业活动。规划中的三个综合体（外贝加尔—满洲里，海兰泡—黑河，滨海边疆区—绥芬河）都没有正常投入使用，俄罗斯一直没有建设保证综合体运营的标准化基地。至今为止，俄罗斯也没解决中国公民进入贸易综合体的手续简化问题。

中俄地区间合作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区间交流的财政基础薄弱，中俄双方的大型资本对地区间交流缺乏兴趣，没有参与其中。

第三个问题是地方官员和社会组织在建立和保障良好的中俄合作环境方面作用微小。比如，中俄友好协会只是开展一些纪念性活动，对于两国经贸的发展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第四个问题是中俄两国国内的社会心理环境仍旧欠佳。虽然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但两国人民仍然缺乏了



解。在俄罗斯，“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光头党仍对中国的留学生、学者和商人怀有敌意。在中国，普通公民对勘界问题关注程度不够，边境地区的犯罪活动日趋猖獗，已经威胁到俄罗斯游客的安全。可见，中俄两国人民的彼此不信任感和偏见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中国俄罗斯年和2007年俄罗斯中国年的举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但是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第五个问题是生态和非法移民等由现代化产生的全球性问题。2005年，中国吉林一家化工厂的苯泄露事故对松花江和阿穆尔河造成了严重污染，由此引发了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生态问题的讨论。

此外，走私、灰色清关、投资积极性低、逃税和商业文化差异等，也是中俄地区间合作的阻碍性问题。

三、前景

总的来说，基于中俄对本国发展的渴求，两国地区间合作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在中俄地区间合作中的核心利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大中国商品在俄罗斯消费品市场中的份额；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原料储备进行加工，防止其对中国产生威胁；发展俄罗斯境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中国东北省份向欧亚市场运送货物的问题；将部分生产活动转到俄罗斯境内；扩大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2003年，中国政府关于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决定提高了该地区同俄罗斯境内经济交往的积极性。各个省份的领导层都在努力加大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一些学者也认为，发展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是东北地区得以成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2007年，国家发改委制定和颁布的《振兴东北计划》明确规定：中国希望利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振兴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为此，中方大力宣传要充分利用中国东三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加强两国在振兴东北和发展远东方面的合作。

然而，俄罗斯方面仍旧没有明确的地区发展战略和计划。2006年12月，普京提出的关于制定东部地区发展战略的任务也葬送于莫斯科的官僚制度之下。这表明，俄罗斯政府部门的利益还是凌驾在民族和地区利益之上的。莫斯科对中国在当代俄罗斯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制定利用中国的潜力来为俄罗斯自身发展服务的计划。此外，莫斯科也没有意识到与中国的合作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重要性。现在，中国东北各省的负责人已经在考虑如何从“单纯的边境贸



易”向“全方面、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转变，而俄罗斯仍未在两国发展远东和振兴东北方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由此看来，未来几年中俄地区间合作将出现以下趋势：一) 中俄地区间贸易的性质和结构将发生改变。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不会有实际提高，而中国获得西伯利亚和远东原料资源的可能性仍旧不大。二) 倒爷贸易将得到一定的控制。三) 中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原料领域中的投资额将有所上升。四) 两国将提高对跨国性项目的关注，尤其是在生态领域。五)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吸引教育程度更高的、更符合该地区需要的中国劳动力。六) 地区间合作和边境合作在中俄关系中的重要性将有所提高，这些合作将成为推动东亚区域集团化的一大重要因素。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地区间合作的潜力，俄罗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克服俄罗斯政府的“莫斯科圈子”综合症，即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中央政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提高地区间合作的协调程度；第三，监督和调整合作的行政和标准法基础，包括分析和完善已签订的条约，调整俄罗斯的法律法规，与中国签订新的有关边境合作等问题的协议；扩大文化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俄罗斯决策层应当意识到，就现实情况来看，中俄地区间合作的前景对俄罗斯来说并不乐观。

尽管中俄双方各自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但进一步发展中俄地区间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希望中俄双方能够着眼于合作的利益空间，为更快更好地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合作机制做出各自应有的努力。

(俄语学院劳灵珊根据拉林·维克托·拉符连季耶维奇
载于2008年第二期《远东问题》上的同名文章编译)

政治软实力与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史泽华

一、软实力的概念及政治软实力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其渴望的利益”，是“权力的第二个侧面”，即“一个国家对他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²具体而言，软实力作为一种资源能力和行为能力兼具的权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合理、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

以奈的“拥有使人向往的价值观”的能力为核心分析框架的政治软实力，是软实力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析对象。阎学通甚至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³按照他的定义，政治实力包括：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内容。阎认为，与文化软实力相比，政治软实力更具重要地位：“文化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增强一国的软实力，文化实力的削弱并不必然削弱一国的软实力”；“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文化实力的发展，但文化实力的发展则不必然带动政治实力的发展”；“以政治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以经济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陆钢提出了与阎学通截然相反的论点。陆钢认为，软实力的核心应该是文化实力，而不是政治实力。⁴

其他学者并没有过多争论这两种实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重在对软实力的内涵做出全面性探讨。较早、较系统地探讨软实力问题的王沪宁认为，软权力的范畴应该包含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国家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六个方面。⁵在王的分析中，虽然认为软权力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但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被放在首位，明确凸显了政治要素的重要性。在门洪华对软实力的分析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了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二者，成为中国展示和构建软实力的主渠道。⁶这一分析，实际上是对政治软实力和软实力做了同构性处理。黄朔风则明确地把软实力分为政治力（国家战略、政治体制、政府素质、国民凝聚力）、外交力（政策、对外活动、对外援助、国际影响力）与文教力（文教队伍数量与质量、文化投资、教育普及率、广电影视出版）。⁷

尽管对政治软实力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存在争论和质疑，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它的存在。论及政治软实力的内涵，学者们也主要定位于政治体制及相关领域，包括政治系统、政治领导、发展模式、观念、政府素质、国民凝聚力和国家战略等。本文认为，政治软实力既包含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又包含从更高层次决定这些制度安排的政治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可操作的“软权力”，政治软实力既包含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两

尽管对政治软实力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存在争论和质疑，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它的存在。论及政治软实力的内涵，学者们也主要定位于政治体制及相关领域，包括政治系统、政治领导、发展模式、观念、政府素质、国民凝聚力和国家战略等。本文认为，政治软实力既包含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又包含从更高层次决定这些制度安排的政治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可操作的“软权力”，政治软实力既包含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两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成果。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李永辉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2 《约瑟夫·奈教授北大演讲：中国软实力的崛起》，2007年12月14日。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1499/rise_of_chinas_soft_power.html

3 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12版；“文化资源需要政治运用”，《环球时报》，2007年8月2日，11版。

4 陆钢：《文化实力弱让中国失分——与阎学通教授商榷》，《世纪行》，2007年第7期。

5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6 门洪华：《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13页。

7 黄朔风：《综合国力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种资源能力，又包含国家将这两种资源禀赋应用于国内外的能力。

二、新世纪政治软实力的建构及其与周边外交的互动

中国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中国必定要把大量的外交资源倾注到周边关系中。周边地区是一个国家维护主权、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战略依托和促进国内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外部屏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改善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的、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力图实现的基本外交目标。大体来讲，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受到国际格局变迁、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以及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与制约，这同时也和决策者的主观认识和世界战略思想发展变化、国内政治制度变迁有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边安定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但是，由于国家数目众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异、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多民族和多宗教交织共生、边界和领土争端频发、外部大国势力干涉和介入明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体性、专门性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形成较晚。

新世纪以前，周边外交一直没有被视作单独的战略单元，而是仍被当作大国关系和第三世界战略的一部分。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在对外交工作进行回顾时曾提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⁸这是第一次在类似级别的报告或文件中提及“周边外交”一词。

90年代以来中国对软实力战略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是一种上至政治哲学、下至具体制度设计的深度调整，也是一种包含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等软实力的各个侧面的全面调整。其主要脉络表现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意识形态划线、绝对二元论看待不同利益体间关系的斗争哲学，演变为以平等、合作、协调、均衡为手段，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以促进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为目标的新政治哲学。在新政治哲学的指引下，价值观念得以重塑、政治制度得以改良、文化战略和外交战略也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从发展的角度，这一过程同时也可以被看作发展观念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过程。目前，这一进程仍在向前推进。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落实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⁹

1. 新世纪中国政治软实力建构的特色

(1) 政治软实力的建构被统合到文化软实力建设之下。其特色在于：不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视为孤立的个体，而是把它看作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文化的其他侧面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再用新的社会文化观念指导制度建设。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可以避免社会重新陷入唯政治论和给予国际敌对势力借题发挥的空间。李长春在《增强文化软实力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最重要任务，是“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舆论环境；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大力促进社会稳定；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¹⁰在现阶段，这种提法符合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特点，也有利于这两种软实力的建构。

(2) 政治软实力的基本特征：肯定政治价值的多元性本质，尊重他国社会发展道路，重视国际平台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借鉴意义，追求具有普世意义的共同价值和构建国际和谐。胡锦涛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9 胡锦涛：《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2007年10月15日。

10 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增强文化软实力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2009年01月06日。

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¹¹在政治价值观念的实践和推广方面，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拆穿了“西方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这一伪命题，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¹²

二是提出普世价值可以成为中国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有内在一致性，中国完全有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追求这些价值，走向民主和法治。可以以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的发展，但不允许怀有“救世主”观念的某些西方国家把“普世价值”作为谋求霸权和扩张势力范围的工具。在对普世价值进行理性解读的基础上，中国在探索有自身特



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时更加自信，也开始更加切实地立足于本国实际。在国际层面，政治上的互信共存，也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基础。有人认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逐渐地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仁爱、和谐等普世价值观导入政治语境中，并发展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鲜活理念。换句话说，政府、民间及国际间的互动，已培养出中国公民尤其是城市市民较为成熟的政治改革观——‘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¹³

(3) 政治软实力与外交软实力综合建构。表现为以和平、共赢性外交促使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同，基于国内政治变革基础上提出的和谐世界构想成为

指导外交政策的政治指针。如温家宝所言：“没有地区和平安宁的环境，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就谈不上发展与进步。我们应倡导和谐理念，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通过协商化解矛盾，增进各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实现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¹⁴以中国与中亚关系为例，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不仅很快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解决或友好谈判边界领土问题，而且高层领导人频频互访，签署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边界以及在边境地区撤军的条约和协定，双方都表示要建设新的“丝绸之路”，使“我们的

联系将比我们的祖先更加宽广”。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以世界眼光谋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发展的开放性。强调以开放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把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一个开放性的视域来考察；强调要处理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我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放在一种宏大的全球视

野中去思考；强调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¹⁵

(4) 中国的政治软实力已经部分得到了西方大国的认可。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法德等国家提出了以“伦理、发展、调控”为标志的“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新闻周刊》却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发表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评价。该文章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

11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8/content_10524481.htm

12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2007年2月。

13 陈冰：《中国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联合早报网》，2008年12月30日。

14 温家宝：《共建和平、繁荣的和谐东亚——在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月14日。http://gqt.org.cn/leaders/200701/t20070116_13116.htm

15 弓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党建》，2007年4月25日。

中国的“非典型性”经济表现在“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操控股市、工业产品的价格、银行的经营，是国家混和（调控），指令性资本主义”，而这又恰恰是中国抵抗危机能力强的原因。中国令人震撼的能力是“以连贯的方式推动和引导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达到共同的目标”。在对政治制度的评价中，该文认为，“中国领导人对公共情绪包括政治情绪的关注和解决方式”是“中国混和市场（导致的）最引人注目的演变”。“中国政府已经吸取了过去的错误，过去十年中国出现过许多混乱事件，但都被更好的解决了”。¹⁶有人认为，这标志着在全球经济危机衬托下的中国模式终于被全球特别是西方所认可和接受，甚至成为他们借鉴的榜样。¹⁷

（5）政治软实力以硬实力的发展壮大为根基。政治软实力可以促使其他国家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产生向往”，但吸引力不是强制力，不同引力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性关系。发展软实力，可以增强世界发展的多元性，而不是增加实现“世界大同”的可能性。目前，外源突发性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依然较大，如奥运火炬传递受阻、西藏314事件等。这类事件的发生，是政治软实力竞争激烈化的一种表现。在领土争端等一些传统问题上，硬实力的壮大依然是基础，软实力只能起辅助作用，正如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形成，强调理义、文德、攻心、教化等文明道德之吸引力，首先是建立在“蛮夷”忌惮于中国大国国力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目的其实不是达到类似于西方“民主和平论”所设计的美好图景，而是维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世界和平。有人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完全在于硬实力的增强或者运用硬实力施加软实力。¹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观点并没有错误。

2. 新世纪政治软实力建设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

中国正在逐步成长政治软实力，正在一步步增强自身的辐射力。正如2005年12月29日，奈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认

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相去甚远，但如果忽略了中国在此方面的进步，则将失之愚蠢。”¹⁹同时，随着中国对于自身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及发展模式越来越自信，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也在走向成熟。主要体现在：

首先，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国际制度能力逐渐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成为实践国际参与活动的首要平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起点，经过前面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中国明确认识到加入国际制度是打破包围、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参与国际制度以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为基本特点。在国际社会或重大全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变得更加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宣示，它意味着中国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核心认同与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结合起来，后者与国际制度有直接的关联，而国际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目标就这样在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中构建起来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所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接近于0，而到90年代中期，该数量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和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当然，整体看来，中国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很难说进入决策层主流，发挥核心作用，在国际组织中的活跃程度不够，竞争力不强。²⁰不过，中国争取在各类国际组织中重要发言权的努力正在迅速成长。其中，中国在非政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的能力发挥过程就是典型的实例（参见附件中的课题阶段性成果《博鳌论坛的中国精神和亚洲共识》）。

其次，在政治软实力的支撑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全方位性更加明显，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逐步深入。当前，全面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和平与友好关系已经成为中

16 Rana Foroohar, "Why China Works: A look at bright spots in the recession begins with Beijing, where state control is looking smart." NEWSWEEK Jan 19, 2009.

17 宋鲁郑：《美〈新闻周刊〉高调肯定中国模式的背后》，《联合早报网》，2009年1月16日。

18 如美国对外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吉里（Bruce Gilley）认为，当代中国一直通过它的硬实力施加其软实力，包括军事威胁和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施加影响的能力。参见Eser Pan, "China's Soft Power Initiative," May 18, 2006,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715/chinas_soft_power_initiative.html?breadcrumb=%2Fpublication%2Fpublication_list%3Fgroupby%3D0%type%3Dbackrounder%26filter%3D271.

19 约瑟夫·奈：《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财经文摘》，2006年第3期。

20 《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http://www.china.com.cn/node_7000058/2007-04/02/content_8047647.htm

国周边外交政策的主旋律。例如，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上，温家宝提出要“构建一个政治上互信共存、经济上互利共赢、安全上互助共济、文化上互鉴共进的和谐东亚”²¹，在中国对东盟战略中，政治和文化软实力已经占据了相当多的份额。新世纪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已经超越了以硬实力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包括政治价值观在内的软实力的作用在外交实践中不断获得肯定，“单元”层次的变化对体系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多轨外交、公众外交、媒体外交提供了更多手段选择，全面合作关系和共同发展理念的酝酿和形成，成为必然趋势。有人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共赢所带来的磁场效应，将是新亚洲繁荣与稳定的一大关键。²²泰国曼谷的一家调查中心08年底就“谁是泰国人心目中最亲密的朋友”进行调查，结果有76%的泰国人认为是中国，不到8%的人选择了日本，而选择泰国长期军事盟友美国的人仅为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当1973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作为第一个访问泰国的中国团组抵达曼谷时，饭店把他们房间的电话都切断了，对中国人的防范和戒备可见一斑。²³

再次，中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建设与周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对比效应更加明显，中国社会的外部安全性在提高，中国周边外交的辐射力也在走强。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等）新世纪以来正在经历着重大国内变革。迄今，泰国等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国家进步的首要因素，欧美国家所开出的政治“良方”对于政治稳定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自主性意识正在走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发展理念上认知趋同态势也已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因素可以被认作亚洲地区国际体系变革的一部分，因为一些对于解释国际问题极具重要性的“国内政治因素”发生的变革，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家目标、他国对这些目标的估算能力和估算结果。这为中国外交新战略中软实力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例如，现任巴基斯坦总理扎尔达

里曾承诺，每三个月来访一次中国，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向中国取经学习”。²⁴现任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也渴望学习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带领人民走出贫穷，同时学习如何保持民族多元性、宗教信仰及对文化作永续发展。”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访问上海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许多方面值得斯里兰卡学习。”²⁵媒体有关朝鲜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经验的报道也不鲜见。

三. 新世纪政治软实力建设中的问题及其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挑战

有台湾学者认为，一个对外战略布局更加细致、灵活的中国大陆，其最大的变量便是来自内部的问题与外部的反应。就内部问题而言，未来大陆的内部问题或政治发展，是否会影响其外交战略或行为，或透过外交行为来合理化内政考量；就外部反应而言，在一个“复杂依赖”的全球体系下，许多国家已经与中国大陆建立起更紧密的经贸互赖关系，但显然并不急着“选边”，而此一维持双边或多边平衡的外交作法，将随着霸权兴衰与外交决策的良窳而出现变化。²⁶这恰恰也是目前中国政治软实力面临的两大问题。

(1) 中国的政治软实力“品牌”仍比较弱小，仍需要长期的建构和考验，而其远景仍取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败。基辛格咨询顾问公司总经理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即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在英国外交政策中心2007年2月发表的《淡色中国》（Brand China）的研究报告中，雷默对中国的形象并不乐观。他采用了电扬品牌传播公司在全球所做的一项民调结果，并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品牌很弱小，这个国家在海外不受信任。”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劳动力供应的基础上，且以环境恶化、收入差距过大等为代价，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也愿意“复制”中国的发展模

21 温家宝：《共建和平、繁荣的和谐东亚——在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月14日。http://gqt.org.cn/leaders/200701/t20070116_13116.htm

22 阮宗泽：《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 中国建构大周边外交遇良机》，《解放军报》，2003年10月20日。

23 《中国周边外交分量重》，《环球时报》，2008年12月17日。

24 《巴基斯坦总统来华招商 称中国可用巴方出海港口》，《东方早报》，2009年2月25日。

25 《港报：普拉昌达学习中国 希望尼泊尔走进社会主义！》<http://www.1n0.net/Article/zbjs/55128.html>

26 林修祺：《台湾关注大陆周边外交》，《凤凰视点》，2006年9月9日。

式，因此它难以构成扩大中国影响的软实力。²⁷有人仍不相信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存在，认为中国软实力的局限在于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缺乏吸引力。²⁸但更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问题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郑永年认为，“民主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并不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但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后，民主化则是有可能的。”“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将来发展得好，中国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²⁹

(2)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在某些方面加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竞争关系。尤其是中国不以意识形态为前提，坚持与一些人权记录很差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开展经济合作的办法，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有人认为，这涉及中国外交的合法性问题，必然制约中国软实力的发挥。³⁰还有一些评论者则对中国的软实力充满

怀疑和敌视，甚至提出中国软实力威胁论。有人认为中国模式的大致内容是，“国与国之间可以在国际市场交易，但能够自主控制本国的经济前途、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这个理念已经对美国的‘平面世界’哲学和欧洲推崇的自由多边主义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挑战。”³¹客观地讲，这也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如何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用经济制裁、军事高压和政治批评的方式对待其他国家，又不过多依赖和不挑战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格局与秩序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从周边外交的角度看，新变化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因为有些时候本国传统外交原则的改变就意味着战略信誉的丧失。例如，缅甸问题带来的冲击就是典型的事例，中国在处理该问题时的价值观定位，会直接影响到对方和第三方对自己的认同。目前，中国“一直认为缅甸国内发生的事情是缅甸内政，应由缅甸人民和缅甸政府通过自主协商加以解决。同时，中方也愿意看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缅甸周边邻国，能够在尊重缅甸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前提下，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帮助缅甸推动民族和解进程。”³²充当这些因政治民主问题而被西方称为“独裁国家”的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桥梁”，将是中国周边外交中面对的长期而棘手的任务。



27 Phillip C. Saunders, ed., “China’s Activism: Strategy, Drivers, and Tools,” Institute of 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06.

28 Eser Pan, “China’s Soft Power Initiative,” May 18, 2006,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715/chinas_soft_power_initiative.html?breadcrumb=%2F_publication%2F_publication_list%3Fgroupby%3D0%26type%3Dbackground%26filter%3D271.

29 郑永年：《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30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pp.28–29.

31 参见《另一种“中国制造”将挑战欧美？》，《联合早报网》，2008年12月26日。<http://www.zaobao.com/wencui/wencui.shtml>

32 《刘建超就缅甸总理访华、胡锦涛主席访美答问实录》，2006年2月14日。<http://www.shjubao.cn/eastday/node81741/node81761/node117669/userobject1ai1851246.html>

《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 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

作者：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学院院长

出版时间：2009年5月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两国乃至世界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本书旨在对两报在1993—2002年10年间的中国报道展开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揭示两报中国报道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运用新闻传播学原理剖析它们在中国报道上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及其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对外传播的大策略与操作性技巧。

本书围绕5个基本问题展开。第一，《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中国报道到底报道了什么？作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两报中国报道的议题分布特点及其在10年间的变化规律，并比较了两报议程设置的异同。无论从研究所涉及的原始文本的数量和考察时段的跨度，还是从跨国新闻媒体的比较视角来说，本研究在国内学术界都具有突破性意义。

第二，两报是如何报道中国的？如果说对“报道什么”的追问关注的主要是议程设置的话，那么，对“如何报道”的追问所揭示的则是两报中国报道所体现的新闻选择、新闻价值、叙述框架、乃至作为话语的新闻文本在图式、标题、导语、信源、文体等等层面的重要特征。国内学术界对美国报刊中国报道的研究多侧重在“报道什么”的问题上，对于“如何报道”、尤其是在新闻话语层面的“如何报道”问题尚无系统研究。在此意义上，本研究深化了学术界对西方媒体中国报道的研究。

第三，《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为什么如此报道中国？两报均属西方媒体，都奉行自由主义新闻理念，都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价值体系，都依循商业化市场运作规则，都派出了驻华记者。与此同时，两报又属于不同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同中国的外交、经贸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利益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差异。所有这些因素对两报的中国报道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考察使



内容介绍：

《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堪称世界报坛泰斗，在西方报界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对美、英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成果。

本书的探索超越了纯粹比较新闻研究的范畴，进而上升至传播学的解释和批判层面来审视两报的中国报道。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研究将两报的中国报道作为由西方媒体所主宰的国际新闻传播的典型案例分析进行剖析，以此为广义的国际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第四，两报中国报道的质量怎么样？“信息质量”是评价媒体表现的关键指标之一。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依据东西方新闻界普遍认同的真实、客观和公正三项基本原则，对两报中国报道的整体质量作出了评价。

最后，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国对外传播？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书进而深入探讨了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国际形象以及如何设定中国新形象的问题。基于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本书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对外传播界定了指导方针，并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对策。

本书第一章为定量分析（内容分析），重点探讨两报中国报道的议程设置。这一部分的研究基于从1993—2002共10年间两报中国报道总数之中抽取的样本，统计了7个大类的数据，包括报道频率、标题、长度、体裁、稿源、发稿地点、和议题（共10个类别，分一级、二级和三级议题）。定量的内容分析旨在揭示两报中国报道的可量化的显著特征和一般规律。

第2-7章为案例分析，包括北京申奥报道、长江特大洪灾报道、中国共产党报道、中国人权报道、台湾问题报道和经济报道，分别涉及体育、自然灾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等不同性质的议题。案例分析综合运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话语分析）的方法，以期揭示两报中国报道的潜在信息与深层逻辑及其与各自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复杂关系。

结语部分依据真实、客观和公正三项原则对《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中国报道进行总体评价，探讨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形象的深层问题，并依据本书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为中国的对外传播提出对策。

本书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研究在5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第一，推进了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媒体中国报道的评价。

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的观点基本上摇摆于“妖魔化”与“非妖魔化”之间。本书另辟蹊径，引入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真实、客观和公正等三项基本原则，基于长



时段的定量分析和系统深入的案例分析，对以《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中国报道的质量和特点进行了重新评估。

从真实的角度看，两报的中国报道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案例分析所涉及的新闻、社论/特写和读者来信表明，两报记者在报道中国时并无凭空捏造、有意歪曲事实的明显表现，基本上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源，并核实所采用的消息与数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两报记者有时采用了过多的匿名信源，而且过分轻信小道消息；这一点在言论类文章中表现尤为明显。包括两报在内的西方媒体热衷于搜寻关于中国的“内幕”消息，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媒体自身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上的“缺席”以及有关部门的新闻发布机制不健全有关。

从客观的角度看，两报绝大多数新闻能够遵循专业规范，专注于对事实的报道，剥离记者主观的情感、态度或评判。有时候，两报记者（特别是《纽约时报》记者）甚至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进行大量艰苦地调查和采访，最终写出很有深度和新意的报道。考虑到他们必须克服的语言与文化障碍以及种种制度约束，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应该得到赞许。但遗憾的是，在报道与政治和国家利益相关的议题时，受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两报记者常常违背客观性原则，在叙述新闻事件的时候流露出强烈的主观倾向。

从公正的角度看，两报的中国报道比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规范。首先，在报道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时，两报记者都过分偏袒矛盾的一方，即“法轮功”成员、持不同政见者、海外台独或藏独主张者、某些西方人权和宗教团体等中国政府的敌对势力。在对这些敏感



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报道中，读者很难听到中国政府或中国绝大多数公民的不同声音。其次，在报道中美或中英之间的冲突性事件时，两报记者过分偏袒本国政府或利益团体的意见，而忽略或轻视中方的关切。再次，无论是在议题的选择上，还是在对具体事件的报道角度上，两报记者常常不能遵循公正性所要求的完整报道或全面报道原则。最后，在言论性文章方面，虽然不能说两报完全排除了关于中国的不同声音，但至少可以说，两报关于中国的言论往往被美、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框架下的刻板化偏见所支配。其结果，两报中国报道的质量严重受损，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如下特点：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强扭事实，片面报道；主观武断，强加于人；不给更正，难以申辩。

第二，深化了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识。

本书的结论超越了国内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正面”/“负面”判断模式。作者论证指出，中国的国际形象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被西方媒体完全“妖魔化”了。以两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均表现出多样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整体社会发展均持基本肯定态度。的确，两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也大量存在，但这是西方媒体一以贯之的新闻理念所致，它们对自己国家国内问题的报道同样如此。即便是负面报道，国际媒体的中国报道基本上是忠实于事实的。当然，报道上的不平衡或不公正现象也是存在的。作者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国形象的危机不在经济方面，不在社会方面，也不在文化方面；中国形象的根本危机突出表现在政治

方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严重负面政治形象上。

第三，为中国形象重新定位。

随着中国社会全面大踏步前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迫切需要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与自己地位相称的良好形象，这一点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共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从学界到政界都一致呼唤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对于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国际形象，我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基本共识。作者认为，要改善中国形象，首先必须界定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中国形象。对中国形象的界定既是对中国国内社会发展方向的定位，也是对中国对外传播方针和原则的定位。

作者指出，面向21世纪，中国的对外传播应致力于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民主的中国、人权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创新的中国、生态的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与负责任的中国。这一定位建立在对中国对外传播政策的历史考察、对当代国际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透析以及对中国国际形象现状的实证分析之上，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明智有效的对外传播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四，在操作层面探讨了加强和改进中国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

本书结语部分重点探讨了5种改进中国对外传播的技巧。其一，协调各种对外传播资源，大力开展“主题

传播”，在继续塑造经济腾飞的中国与负责任的中国形象的同时，唱响民主、人权、和谐、创新和生态中国的主旋律。其二，高度重视“事件传播”，一方面从战略高度策划一系列推展中国新形象的海外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建立应对不可预测危机事件的有效传播机制，化危机为对外传播的契机。其三，实现“内外一致传播”，以提升中国媒体的整体信誉和传播效果。其四，巧妙推进“借船出海传播”，通过与国际知名媒体的合作或利用海外媒体平台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最后，同步推进“行动传播”。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要大力加强自己的对外传播，通过向世界说明中国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切不可迷信宣传或传播万能的神话。中国形象的根本改善首先和最终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真实状况。

作者最后呼吁：在我们大力加强和改进用文字、声音和画面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同时，让我们更加努力地用行动向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人权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创新的中国！生态的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和负责任的中国！

第五，全面考察了《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之间存在的异同。

在报道的频率和篇幅上，《纽约时报》超过了《泰晤士报》；在报道的深度上，在新闻报道与言论性文章的分离上，《纽约时报》通常也比《泰晤士报》做得更好。但这些差异都只有量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与国家利益无关的问题上，两报的中国报道是大同小异的。

本书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横向拓展了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形象和西方报刊的研究，将视野从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美国媒体扩展到欧洲媒体，选取英语世界最权威的报刊《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进行跨国比较研究，这使我们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把

握更加全面、更加准确。

其次，本书纵向深化了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形象和西方报刊的研究，不仅对两报中国报道的频率、体裁、稿源、发稿地点以及议程设置等进行了长达10年的定量考察，而且通过系列案例分析，运用传播学理论深入剖析了两报中国报道的意识形态、新闻选择和叙述框架。

再次，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国形象的定位问题，试图为新时期的中国对外传播界定指导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改善中国对外传播以最终改善中国形象，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对策。

最后，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探索。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形象的现有研究不乏定量分析，但往往局限于对某一事件的短时段分析；也不乏定性分析，但往往缺少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本书把长时段（10年）的抽样定量内容分析与深度（5大案例）定性文本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使普遍考察与深入解剖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效弥补了定量与定性两类研究方法的固有劣势，使各自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所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实证研究，不仅在国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且对加强和改善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简介

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Kelaniya)成立于1998年,2008年编入凯拉尼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由于斯里兰卡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之一,该中心自成立伊始便致力于研究斯里兰卡与整个亚洲的交流与相互影响。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南亚地区的研究始终位于重中之重。十年之间,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已突破斯里兰卡的研究局限,并把研究范围拓展到整个亚洲地区。除此之外,该研究中心还与其他亚洲研究所合作,以扩大自己的研究视角。关注亚洲,研究亚洲,以及普及亚洲研究成为了该中心新时期的历史使命。

以下是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

1.对亚洲典籍的研究:该中心对亚洲典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贝叶经上。贝叶经源于古印度,佛教徒们经常用贝叶来书写佛教典籍。它是研究古代西藏佛教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的重要原始资料。这些研究对佛学、语言学 and 古代印度和中国的交流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对亚洲语言文学的研究:僧伽罗语、泰米尔语、梵语和巴利语是对斯里兰卡影响最大的四种语言。而在文学方面该院主要集中于对罗摩衍那和佛本生经故事的研究。而佛本生经故事则是研究中国南北朝文化的一把钥匙,同时唐代变文的研究也必须借鉴贝叶经的研究。

3.对亚洲社会文化遗产的研究:该中心对古代亚洲建筑有深入的研究。此外,近几年来,亚洲各地区的交流史也成为了其热点研究的题目。例如,南亚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印度洋贸易史。郑和下西洋途中经过斯里兰卡,对当地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该中心关注的对象。

4.对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南亚的近代史与英国的殖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该中心致力于研究西方世界眼中的南亚。与此对应,16世纪以后受西方影响的南亚艺术也是其研究的重点课题。

5.对亚洲移民史的研究:主要研究外国移民在斯里

兰卡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以及移民对斯里兰卡社会的影响。

6.人类学研究:韦达人生活在斯里兰卡中部原始森林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因此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活化石。他们的农业耕作方式、捕猎方式和原始宗教仪式、婚配习俗都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该中心将人类学研究与生物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考察韦达人的DNA来研究早期人类。

7.对当代亚洲的研究:对当代亚洲的研究偏向于政治外交领域,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贸易合作、反恐合作、文化交流等。中斯关系和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都是该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

8.对亚洲艺术的研究:现当代小说、诗歌、戏剧和视觉艺术都是该中心的研究课题。而且该中心按时举办文化展和画展。

9.对亚洲宗教的研究:依托于凯拉尼亚大学丰硕的佛学研究成果,该中心致力于研究亚洲各宗教交汇的课题。其中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与基督教在斯里兰卡共生并存的研究。

此外,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将于2010年举办南亚建筑国际研讨会

联系人: 凯拉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Anura Manatunga先生

联系地址: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K 3-017,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Kelaniya, Sri Lanka

通讯方式: 电话: 94-11-2911391;

传真: 94-11-2911485

邮箱: am@kln.ac.lk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 韩昊东 编译

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简介

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项目 (The 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 (EALS) at Harvard University) 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对东亚国家的法律、法律史, 及其与美国的相互影响进行最广泛研究的学术项目。为了满足当时在律师和国际法、比较法学者们中间日益增长的对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法律文化的兴趣, 该项目的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于1965年成立。

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中心东亚法律体系方面的研究提供指导, 并为驻中心访问学者的研究提供资助, 与哈佛大学其他研究机构的联合研究项目也能够建立在独立的研究基础上。中心还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外课程体系, 包括非正式的系列午餐演讲和亚洲法律方面的主题讨论, 工作坊系列提供更加正式的研究项目主题讲座, 另有外语讨论小组应用外语讨论法律问题。

东亚法律研究中心由William P. Alford教授(安守廉)、Henry L. Stimson教授领导, 并受到包括安守廉教授、Mark Ramseyer教授、日本法律专家Mitsubishi教授、Oliver Oldman教授组成的教授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中心由独立捐助人和慈善基金支持。

联系方式:

邮件: eals@law.harvard.edu

地址: 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Harvard Law School,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02138, USA

电话: 617-495-3142

传真: 617-495-8129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李晓辉 编译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栖霞 赵宗锋

编辑 谷晨曦 王惠英

装帧设计 蔡颖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4, 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